



# 科學·宗教·文化背景

鄭志誠

文化背景統御著一個文化體系內的各種文化活動，形成一種文化格型。西方的文化背景是理智；理智傾向認知，提供知識。中國的文化背景卻是另一種東西，它導向價值，融入生活。

去年六月，方勵之教授發表了一篇文章，題為「宗教與科學」。方教授自己說，二千多年的中國文獻，絕少談到宗教與科學之間的關係，所以他的文章是一篇很不易寫得好的文章。話雖這麼說，在拜讀完他的文章之後，我思潮起伏；方教授的文字，帶出了不少值得思考的問題。經過一個時期的咀嚼、整理，我嚐試提出我的看法，冀收拋磚引玉之效。

## 中國和西方有不同的文化背景

方教授寫宗教，寫科學。據他的看法，西方天文學與中國的天文學表現不同，是因為西方宗教和中國的宗教情況不同。換句話說，宗教影響科學。文中寫的是正面的影響。方教授主張；各種文化因素的合作和相互影響，包括科學和宗教在內，是既重要又必要的。

一再細讀方教授的文字，我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，這事實是：西方的天文學和中國的天文學有差異，西方的宗教和中國的宗教也有差異；西方的天文學和宗教自成一類型，而中國的天文學和宗教又

同屬另一類型。這不同類型的事實，帶出了方教授的一個想法：宗教型態影響科學研究；宗教在西方和在中國的類型有別，導致了兩者天文學的研究方式不同。

方教授的這個見解掀起了我一個疑問：是宗教型態不同，導致了不同的天文學型態，還是在宗教和科學的背後有兩種不同的因素，使中國和西方的宗教和科學成了兩個不同的類型？如果答案是後者，跟據方教授文章的看法，文明是一個整體，這整體的各部分會相輔相成，這就可能意味著那兩個不同的因素，不單只影響宗教與科學，還會影響西方文化或中國文化的其他各部分，因而構成東西方兩個不同的精神世界。

這兩個不同的精神世界，應是各有優劣。它們會互相交流，互相補足，融合成一個整體嗎？如果會，當務之急，似乎是要探本溯源，在那不同的因素上下功夫。先是發現它們、認識它們，然後大家接受對方。漸漸對這兩種不同的因素認識深了，不

但能將它們調和，還可以去蕪存菁，將它們發揚光大。這不單交流了東西方文化，還是提升了、完整了人類的精神生活；充實了、豐富了人類的文化遺產。

中國和西方的這兩種不同因素，我姑且名之為「文化背景」。

## 西方的文化背景是理智

西方的文化背景是理智，這個似乎不難肯定。西方學術界重理智，中國人卻不太著重理智。在學術界，西方將人理智的能力發展得淋漓盡緻，由希臘哲學開始，一直到今天的科學，理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它也將人類的認知領域擴展得很闊。而在中國，中國人並不是理智弱，也不是不會用理智。在過去的中國文化裡，曾出現過不少的發現和發明。而且都是猛著先鞭，還頗有深度，只不過是不普遍，也缺之系統的傳授制度。近來中國人出國深造，在西方學術的領會和推動上，並不比西方人差。這些，

都表示中國人的理智能力並不弱，也不是不會用理智。但從整體看，中國人甚至是在學術界，對理智的重視程度，和西方相比，顯然是差了一大截。方教授在文中也提到一些這方面的現象。有宗教方面的，也有天文學方面的。

宗教方面，方教授說宗教早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，甚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（見段二），但宗教對學術界的影響很微；宗教文化只影響知識分子的哲學思想，並不影響他們的個人信仰（見段三）。方教授認為這是中國所特有的現象。連在近代，利瑪竇傳入了西方的科學和宗教，結果是他所引進的天文學被接受下來，而天主教卻不會在中國學者間廣受歡迎。他認為中國人的這種態度，似乎是由於儒家強調社會倫理及功能，而不重視本體論所做成的（見段四）。

驟然看去，這兩段話很容易給人一個這樣的印象：在中國，宗教一早便盛行，但卻不能打入知識份子階層，至少是不影響他們的個人信仰。因為儒

家著重的是具體的社會生活而不是理論。

真相是怎樣的？中國的智識份子是否沒有宗教信仰，而宗教信仰只屬於愚夫愚婦的玩意？抑或是政治家（皇帝）用作統治百姓的一種手段？西方宗教（甚或中國的宗教）沒有談社會倫理，因而不合知識份子的胃口嗎？孔子的「敬鬼神而遠之」和「不知生、焉知死」，是表示他不願多談自己不知的東西，還是表示他對鬼神和死後沒有興趣？這些都是值得史家和學者們認真而深入研究的問題。

不論將來的研究結果怎樣，有一點似乎是事實：西方宗教，很久以來就有一套嚴謹的認知性神學體系存在，而這種體系在中國的宗教是沒有的。中國的宗教即使有理論成份，也不是純理性認知的，而是帶有實踐意味的，與現實的生活連上關係。這種存在於西方宗教的濃厚理性認知的傾向，方教授認為是嚴重地影響了西方天文學的研究動向。不過，似乎我們可以再一次考慮一下上面提過的問題：會不會是在西方有一種文化背景，它影響了宗教，又

影響科學，也影響西方的其他文化活動，使它們形成一個同類型的精神世界，而不是宗教影響了科學？方教授文中第二段似乎也暗示了這種可能。他提到西方宗教承接了希臘哲學的理性成份。如果宗教的理性成份也受人影響，那麼，科學的理性成份，就不一定是受宗教所影響。有可能是：既然亞氏重理智，西方宗教又有很明顯的理智成份，西方的天文學也是走理性的路線，那麼，我們或許可以假定重理性是西方文化的特色；理性是西方文化的背景，它左右著西方的各種文化活動，而不是一種文化因素影響另一種因素。

如果西方的學術背景是理智，中國的學術背景又是什麼？

## 中國文化的背景不是理智

照方文的提示，中國的學術背景不是純認知的理智，而是另一種帶有生活色彩成份的東西。它影響著中國文化的各方面，而形成與西方不同的精神

世界。

方教授在文中說：西方的天文學找尋宇宙內各事物的一致性，傾向於建立普遍的體系，認為一切都是可理解的。而在中國，天文學家們並不傾向於為天文現象找個理性的解釋，更不急於為不同的天文現象找個一致性的理論。但他們熱衷於觀測天象，收集到多於西方天文學家的資料，卻不理他們有沒有一致性。中國學者早於伽利略發現「坐閉舟中，舟行而不覺」，但並不像伽氏般思考「天體物理與地球物理有沒有不同」，而只是用來解釋一個身邊的現象：我們不感覺地球在轉動。換句話說，似乎是西方學術界重理性認知，從知識裡去發現使用和駕御周圍事物的方法，而中國學術界著眼於實際用途，而忽略了更普遍、更徹底的理性認知。

西方學術界，在理論心理學方面，只有起源於亞里斯多德的那一套。在那套心理學裡，人類的最高能力是理智。既然西方學者盡情發展了理智，而中國文化竟然不重理智，那就很容易將中國文化視

為較西方的文化次一等。這不是因為中國人理智弱或不曉得用理智，而是因為中國人不重視理智。

中國人為什麼不重視理智？只因為是一種隋性，還是有另外一種因素在影響著中國文化，像理智在影響著西方文化一般？這因素既然不是理智，還會是甚麼？它和理智有沒有關係？它能將人的精神生活導向何方？

\* \* \*

在亞里斯多德的同期，中國出現了一位學者——老子，他寫了一本道德經，共五千多字。二十多個世紀以來，不少中外學者論述過它。據粗略統計，出現過一千六百多種不同的論述。但不論哪一種，都未能將道德經解成一個完整的體系。我發現，如果將道德經視為一個內心生活的紀錄，它便是一本完整而嚴密的著作；每一章、每一句都相互連成一個整體，一步一步的透露了道如何推動作者，把存在於內心，逼人就範的不良勢力消除，走向一個崇高理想的內心境界。雖然書中說的是過程，是方法，

但方法背後隱藏著一套理論，透露了人的內心結構，是另一套理論心理學。在老子的心理學內，理智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「道」；道是一股先天的內心力，它能辨別價值和反價值，萬無一失。且能推動人走向價值，將不理想的內心狀態改變。這一切，都是理智無能為力的。

## 「道」是另一種靈性能力

在亞氏的心理學內，理智唯我獨尊。它將感官提供的資料透視、分析、組合、推論，發展了形上學和科學，擴展了人類的理性認知。在道德經的心理學內，「道」揭示人的內心實況，顯示其優劣，並提供一個理想的境界，將內心一步步的改變，使一個人的普通心境變成一個高貴、完美的心靈。道美化了現實的人生。

亞氏的心理學是認知的心理學，道德經的心理學是生活的心理學。

亞氏心理學內的理智，其對象雖然包容了倫理



和美學，甚至包含自然神學和宗教生活，但只是在認知的層面，與實際的人生起不到直接的關係；它只充實了人的認知，卻不能改善人的內心狀態。亞氏的心理學，似乎還想將道德經內的「道」吸納，使之成爲理智的功能之一。但由於理智始終不是直接的認知官能，它只能藉感官提供的資料來提取認知的對象，始終不能像感官一樣直接接觸及物質的世界，也不能像「道」一樣直接接觸及價值領域，而只能對這兩個世界作抽象的認知。所以，雖然亞氏心理學傾向於用理智來取代「道」，始終是力有不逮。或許將來有一天，兩套心理學調協了、融和了，在「道」的指引下，理智將探入價值領域，像今日在感官的協助下探入物質世界般，發展出實用的價值學，豐富人類的精神生活，就像它發展了科學而豐富了人類的物質生活一樣。到那時，人類可能不像今天一般，懷著空洞的心靈去享受物慾的刺激，而是在平衡的心境下，將每人每物放到恰當的位置，享受內外協調的完整人生。

我一直都盼望有個機會將我對道德經的研究結果寫下來。在這件工作未完成之前，要介紹道德經中的道，可將它歸結爲三種內容。

## （一）道，是一股內心力量

在道德經中，作者將「道」和理智對立。他認爲兩者都是先天能力，但對內心生活而言，理智不但起不了正面作用，還會做成破壞。推進人精神生活的是另一種能力，他稱之爲「道」。道能觸及事實，它的認知對象是美醜善惡；在揭發事實真相的同時，道能推動人擇善去惡，改變內心。如果人肯讓道來處理內心問題，則會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境界。

道除了是個人生活一大動力之外，其活動成果在西方學術界還會起某種作用。

第一，道德經全書都是紀錄內心進展的過程，講的全是方法，是很具體的生活寫照，不但能銜接起現代的心理學，還能對它起一種啓發和推展的作

用，這一點，是純重理智的亞氏心理學做不到的。

第二，如果有人用以直接接觸善惡的官能是道而不是理智，則「有沒有絕對的善惡」這一個困擾著西方哲學界的問題，可能出現一個新動向，來消解某些形上學派和邏輯實證論之間的尖銳對立。

**(二) 道，道路之謂；是內心生活的康莊大道**

在書中，作者描述他怎樣解除內心困難，怎樣一步步走向完美的人格，所以是記載一條心路歷程。作者認定，道這股內心力量，在每人內心都是同一性質。它按照事物真相，去揭發它們的好壞優劣，和它們在人生內應佔的位置。所以，每一個人，不論生活在何時何地，如果內心生活上正途，就必然是道所揭示的那條路。這條道路，作者也就稱之為「道」。

事實上，道德經所描述的內心歷程，在不同

的文化和宗教中隱約可見。說法雖然不同，實質卻是一樣。

**(三) 道，是人類心靈的嚮導**

道德經中有三數章，講及「道」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物，是他將稱為道的內心力量放置在每人內心。作者會和那個「道」有過直接接觸。「道」導引作者走過他的心路歷程。

道德經只講內心生活。從沒講過宗教。但作者提到的這個「道」，卻極像西方形上學裡的「存有」自身，或西方宗教裡的神，因而給美善賦予了一個形上基礎，而且是一個活生生的基礎。這個「道」，不獨是理性要捕捉的認知對象，更是有思想、有情感，會來和人接觸，關心人精神生活的存在體。

\* \* \* \* \*

根據道德經，道的對象是價值，而價值屬於精神界，所以道和理智應同屬靈性能力，只不過作用不同。道和感官一樣，是直接的認知官能，它直接

觸及價值，理智不能直接接觸物質界或價值領域，而要靠感官或道去收集資料，然後加以透視、組織、推論。

西方人重理智。理智型的西方文化發展得很燦爛，這在形上學和科學上表現得很清楚。但由於西方學術界忽視了道，所以在與價值實踐有關的人文學科方面，反而進展不大。

## 中國文化的背景是「道」

中國文化，對理智的重視遠不及西方強，所以在認知性學科的進展上也不及西方。方教授在文中也說過，中國學者強調的重點是社會倫理及功能，而不是本體論。而且，中國學者重視的倫理及社會功能，似乎並不是認知性的理論，而是實踐性的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在傳統的中國文化裡，學者似乎並不是只具有學識的人仕，而是指有學識兼且有高尚的人格；而且有高尚的人格很重要。換句話說，中國文化背景帶領人傾向於美滿的生活，

而不是深奧的知識。

這並不是說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一定比西方人強，而只是說中國文化特色是重生活多於重知識。既然道是與生俱來的天賦能力，任何人，不論是西方人或中國人，不論是古人或今人，都可以遵循道的指引去生活而到達一個很高的精神境界。這些偉大人格，在西方的歷史絕不乏例子。不過，如果「道」是中國文化的背景，中國文化是重生活多於重知識，則發展中國文化，不妨一方面在生活上重視精神價值，將它在現實生活裡活現出來。另一方面則在我們的文獻裡收集有關精神生活的資料，再加以整理和闡釋。而西方學術界所重視的理智，無疑是研究、整理、推介我國國粹的一個有效工具。既然它也是我們的一種天賦能力，不妨加以磨煉、發展。

精神生活在西方並不弱，尤其是在某些人的宗教生活裡。重智的文化背景，絕沒有削弱西方人的道，就像重道的文化背景，也沒有減低中國人的智力。西方文化裡面也存在不少有關精神生活的資料。



如果西方學術界留意到「道」的存在而探索它的活動，以西方對智力的駕御深度，不難發展出另一個學術領域，像曾經發展了形上學和科學一樣。

雖然每人都具有理智，也具有「道」，但由於中國和西方的著重點不同，在兩種文化中，理智和道的表現應有差異，那麼，兩種文化應該是可以互相影響，互相補足。

知識本身沒有意義，它的意義在充實人生。如果人是一個整體，又如果道是人心靈內的一種重要能力，則過份重視理智而忽略道，可能對現實的人生帶來損失。宗教在西方文化裡有頗重的份量。西方宗教在重理智的文化背景上，如果能更意識地給道一個重要的位置，應有助於宗教生活取得更平衡的發展。

天主教對社會倫理有很深入而獨特的見解。但方教授解釋為什麼天主教不會在中國學者間普遍受歡迎時，用的理由竟然是因為中國人「強調的重點是社會倫理及功能」。這值得有心的宗教人士三思。



余秀瞻修女、甘俊邱神父、余信望神父及黃惠貞修女  
攝於廣東省汕尾市伯多祿堂前